

● 赵永铄 著译

蒙古族
古诗译萃与
散论

MENGGUZU GUSHI YICUI YU SANLUN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MENGGUZU GUSHI YIGUI YU SANLUN

蒙古族 古诗译 三 散论

● 赵永铄 著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赵永铄著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311-6900-0

I. 蒙... II. 赵... III. ①蒙古族—古代诗歌—作品集—中国②蒙古族—古代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22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4314 号

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

赵永铄 著译

出版·发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经销/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刷/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960 毫米 1/16 印张/31.5

版本/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维力斯大厦 9 层

电话/(0471)6608179 6608165 邮编/010010

网址/www.im-eph.com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978-7-5311-6900-0

定价:68.00 元

序

本《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是一部好书。它出自一位多年从事蒙古族古、近代文学研究、主笔并主编过蒙古族文学简史、详史的老学者之手，其译著和论著凝聚着作者近半个世纪的汗水和心血，实为难能可贵。

作者赵永铄先生，是我多年交往过的熟人，是我们自治区一心扑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可敬老人。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当他调入内蒙古历史语文研究所（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时，迎接他的是与其他同事一起编写蒙古族文学史的陌生而棘手的工作。一个湖北籍的内陆人，刚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来内蒙古而又不通蒙文蒙语便接受编写蒙古族文学史的任务，对他说来不是那么轻易办到的事。1958年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一直下大力气狠抓少数民族文学资料的搜集和相关文学史的编撰工作。它关系到中国各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体现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国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这一历史事实。因此，赵永铄先生欣然接受新的任务，与所内齐木道吉、色道尔吉、道荣苏等学者一起在老所长额尔敦陶格陶先生的领导和指挥下投入编写蒙古族文学史的具体工作。文学史原始资料基本上都是蒙古文，即使有汉文翻译的，也为数不多，靠非原文作为研究对象万万达不到预期目的。于是赵先生下定决心学蒙文蒙语，渴望过这道语言文字关。他上蒙古语培训班，请老师指教，找同事辅导，背课文，记单词，学会查字典，掌握蒙古文拼写规律和造句句形，一步一步坚持下来。同时，他又敢于实践，边学边翻译，从简单到复杂，一遍又一遍，修改了又修改，既了解了翻译规律又掌握了理应必须熟悉的研究资料。所以，赵先生说这次出版的《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是他“多年从事蒙古族文学史研究积累起来的成果”。有了付出，就有所得。比较熟练的蒙古书面语，给他带来了许多方便，资料上的丰富资源，对他研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赵先生先同齐木道吉、梁一儒先生合著一部《蒙古族文学简史》（1981），填补了国内汉文蒙古族文学史的空白。后来又同荣苏赫等先生合作承担并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重点科研项目蒙古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000年12月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出齐发行。这是一部文学通史、详史，在资料的占有，体例的

宏大,内容的丰富和规律的探讨等方面,都有所突破。

赵永铨先生这次汇集出版的蒙古族古诗译萃计3大类共19(项)篇作品,都具一定的代表意义。第一类包括蒙古古代训谕诗、叙事诗和婚礼词,第二类为古、近代文人诗章,第三类是民间民俗祝颂韵文。把握译文资料的准确性是这本古诗译萃的显著特点。蒙古族古代文学包括书面文学在内很大程度上是与民间口头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正式版本很少,大都留存于各种体裁的著作中流传下来。赵先生在长期的研究中悟出蒙古古代文学的这个特点,在着手翻译的时候,注重准确性,查阅文献,逐一考证鉴别。例如在翻译《成吉思汗箴言》时,为确保所译古诗的准确可靠,他在参阅一些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主要依据《蒙古秘史》和《罗·黄金史》为翻译范本,拟定条目,并将每一诗篇条目后都注明所依据的范本的页码和章节,以求文本的科学性。选择诗作文本时以蒙元以来的书面文献为起点,择取有定论的历代首肯的名篇着手翻译,这是译萃篇较为明智的决策。译者是蒙古文学史家,深知训谕诗、叙事诗和婚礼词在古代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特点及文学价值。译者认为,蒙古族的古代训谕诗是一种说理性的韵文,是蒙元以后发展起来的诗文形式,在蒙元诗歌发展史上带有关键性、转折性的作用;蒙古族的古代叙事诗植根于民间诗歌沃壤,通过情趣盎然的传说故事,寄寓人们对朴素哲理认识的追求和企盼,实际上它的发生与发展是对蒙元以后开拓创新精神的进一步升华和发挥;而蒙古族的古代婚礼词,其辨析说理的诗章,眼界更为开阔,对自然、社会人生有着缜密的分析认识,对宇宙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展望。即使对文人诗章和民间民俗祝颂韵文的翻译,赵先生也始终从一个文学史家的视角和思考去择录和反映的。他的译文,不但保留着诗文原貌、形式特点,而且体现了译者对蒙古古、近代文学的整体考察和具体研究之感悟。一旦译出予以披露,自会呈现出稀有的宝贵价值而被人们所瞩目。

本书第二部分,即“散论篇”,是作者围绕蒙古族民俗、民族、宗教、文学及北方民族史方面展开讨论的文章。尤其论述蒙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族文学的艺术特征及其流变等问题的论文,很有学术见地。《论古拉兰萨诗歌及其诗派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对了解蒙汉文化交流之历史渊源,对研究古拉兰萨、尹湛纳希兄弟四人受汉族古典文学影响之具体途径及其诗歌创作特点,都有极深的现实意义。

古人说,名由实生,故久而益大。赵先生谦谨戒骄,努力掌握蒙文蒙语,能基本利用非汉文资料从事学术研究,在蒙古文学领域做出特殊贡

献。他著书甚丰,除文学史、论译著集外,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诸多蒙古族文学词条的撰写工作,还收集汇总编选蒙古民间故事集三本,在筛选编录中所涉资料不下百万字之多。我想付出如此巨大劳动的成果,它对提高蒙古族文学在全国的影响力,丰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格日勒图

丁亥春节于内蒙古大学

(格日勒图 内蒙古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序 二

2005年,在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召开的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老者面对来自亚、欧、美三大洲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各国蒙古学家,用一种尚不能说流利,但却吐字清晰的蒙古语作了一个介绍性的开场白发言,既提示了所讲民间文学断代的主题,又请指正,顺致谢意。他的口音略带我国南方汉语味儿,发言时神态自若,目光中透射出坚定、自信的光芒。大会确定的会议语言为蒙、汉、英三种语言,学术发言每人限时15分钟,他不多不少正好在限定时间内把论文摘要介绍完毕。会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知道,那掌声是对先生发言的认同,更是对他献身蒙古学研究事业的那种执著精神的敬佩。这位先生就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离休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年逾七旬的赵永铎老先生。

赵先生是湖北人,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来到内蒙古献力于蒙古学研究,如今已近半个世纪。赵先生的蒙古语言主要是自学的,据说,当年赵先生很想同他周围的蒙古族同事练练口语,而他周围的人都能讲流利的汉语,也许对他们来说与其跟这位汉族同志用蒙古语交谈还不如干脆用汉语来得更方便。这一来可就使这位一心想锻炼自己蒙古语口语能力的人难有机会了。赵先生的蒙古语会话能力虽然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程度,但蒙古文阅读能力并不受语言环境的影响,有了很大的提高。赵先生是个“不耻下问”的人,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一批年轻人来到所里,他经常拿着蒙古文书本随时随地请教于这些年轻人,从一般的词义、语法到某一词在作品语境中的特殊含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著作中的不同写法和用法都想探悉,可谓“孜孜不倦”刨根究底。那时,赵先生正致力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子项目《蒙古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先生正是在这个学习、研究,研究、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蒙古文学研究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先生的《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终于要出版了,真该为他高兴,这是他多年来刻苦钻研,辛勤耕耘的成果,这里既有他尚未发表的古诗译作,又有他多年潜心研究的学术著述,这些将要与读者见面了。同时,也该为

广大蒙古文学研究者、爱好者,特别是为那些利用蒙古文原始资料有困难的蒙古文学工作者们高兴。因为,本书的“译萃篇”部分包括译者精心挑选的3大类共19(项)篇蒙古文学经典作品,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汉译本:“散论篇”包括20篇左右的研究论文,这些文章出自一位自小受汉文学、汉文化熏陶而成长的内地汉族学者之手,无疑具有文化对话的视角和意味,自有其特殊的价值。单就“译萃篇”而言,用汉文撰写蒙古学学术作品的人大都有一种体验,那就是对所需资料的鉴别、引文的翻译,尤其是诗歌、韵文的翻译是个很麻烦、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从中古时期到近现代,蒙古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发展变化都很大,再加上文化差异和韵文翻译的特殊要求,这类翻译总是让人左右为难。严格按照原文直白对译,会使原诗的节奏、韵味荡然无存,机械移植原文的形式拘泥于格式要求,又实难准确表达原作的风格诗意。特别是构成诗歌的美的要素、方法、手段在蒙、汉语中大相径庭。可见,先生所作这项工作是个要求很高,难度很大的工作。之所以多年来问津的人不多,除了觉得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学作品难有大的市场,投入产出不成正比之外,这项工作的难度大、要求高恐怕也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原因。

但这项工作终究是要做的,因为这不仅是蒙古文学研究资料建设的一部分,同时还是民族间文学对话、文化对话的必要环节。记得,北京大学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教授在为《奶茶与咖啡——东西方文化对话语境下的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一书所作的“序”中写道:“蒙古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曾经走遍半个世界,在世界很多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和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化都产生过联系,因此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蒙古民族及其文学非常有意义,可开发的潜力也很大。蒙古民族又是一个跨国民族,我国国内有蒙古族,国外有蒙古国,在俄罗斯有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共和国。因此,蒙古文学的研究既有中国兄弟民族文学的特征,又有国外文学的特征。”接着她又说:“……蒙古文学的研究正在走出封闭的民族文学的局限,正在走向世界,走向文化对话。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价值,都要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才能体现出来。自我封闭的、只说给自己听的作品是不能充分体现文学价值来的。正如东方文学的价值是在东西方文学对话中更充分地体现出来一样,蒙古文学的价值也应该是在与汉族文学、藏族文学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学的比较和对话中体现出来。当然,这种比较不是价值评判,而是通过比较来探讨其共同点和不同点,以及他们之间互识、互证、互补的关系。”赵

先生是个较早明白这一道理,又较早着手这项工作的人。他虽然从未标榜自己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似乎也没有系统地去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但从他的学术作品中不难看出,先生始终在关注民族间的文学、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影响关系是颇为明显的。

本书“译萃篇”对诸多源自梵文、藏文的词汇进行考释,其实就是追溯文化传播的源流与过程,而“散论篇”不少文章的撰写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民族间的文化影响问题。如《蒙古族创世神话与萨满教九十九天说探新》、《传说〈化铁熔山〉源流探析——兼谈蒙古人对突厥文化之吸收与融合》等文章多从佛教对萨满教的影响,突厥文化对蒙古文化的影响角度着眼开掘,而《论古拉拉萨诗歌及其诗派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则是一篇深入讨论“古、尹诗派”诗歌创作与汉族古典文学的关系的“影响研究”成果。实践证明,在封闭状态下长期得不到解决,像谜一样悬在那里的某些问题,如果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视野当中,置于超民族、超时空的背景中去研究或许就能迎刃而解。这就是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之于蒙古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也是先生的科研实践给我们的宝贵启示。上溯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文学、文化交流、对话的过程,搞清楚参与各方文学、文化彼此间的影响及其结果,这种努力在蒙古文学界虽然较早以前即已开始,但至今尚未形成令人满意的规模,我们当继续坚持、推进之。

赵先生一生致力于蒙古族文学史研究,他是第一部汉文版《蒙古族文学简史》的编者之一、185万字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的主编之一,可谓成绩斐然。尤其是先生那种认真严谨,务实敬业的精神,是我们晚辈理应毕生效法的。我在翻阅这部飘着墨香的书稿清样、还有那用红蓝黑笔反复改动的手稿时,不难体会得到先生是怎样斟酌词句,再三推敲的。偶尔找出蒙文原作,进行比对时又发现,此译著不同于一般欣赏性读物的翻译,译者所追求的不是“锦上添花”“二度创造”,而是尽可能精准、尽可能保持原作的风貌。说明译者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使译文更符合科学研究的要求。比如,一些不好把握的字词、诗句标注了蒙文读音,并加以说明,一些外来语借词注明意思和语种,甚至附有译者或专家的考证及其出处,研究者利用起来想必会很方便。然而,不论翻译还是研究毕竟都是注定要留下遗憾的工作。一种文化的产物有时在另一种文化中绝对找不到完全对应的事物或表达方式是一种极其复杂微妙的心理现象,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也大有不同,因此使原文的意思、美感、风格,连同它无法捕捉而确实潜在的那种心理效应都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严格说起来诗是不能

翻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或许只能是少一些遗憾，多一些“信、达、雅”了。同理，科学研究是个不断深入、不断前进的过程，前人的研究成果被后人突破、刷新，本不足为奇，重要的是我们力求自己的成果在它问世的时候就应该是解决了一定的学术问题，推进了这项研究的向前发展或为其今后的发展起到阶梯的作用。我想，先生的这部著述可说是当之无愧属于这样的成果。

包斯钦

2007年3月29日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包斯钦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副理事长）



前言

出版《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是我多年从事蒙古族文学史研究的点滴收获。故所译古诗也是我研究过而比较熟悉的一些蒙古文作品。长期以来,为了完成任务,凡涉及我的课题的蒙文材料就特别关注,常去翻阅或笔译,长期积累,终于小有收成,能汇集成册。我是以蒙元以来的书面文献为起点,选择向有定论的历代首肯的名篇着手。于是把《成吉思汗箴言》(以下简称《箴言》)作为开篇,依次包括了成吉思汗的战史和政治生活史方面的古代叙事诗;元代训谕诗《智慧的钥匙》;明清婚礼词;近代文人诗作等等。其中围绕成吉思汗勋业吟咏的诗歌话题,可算得是蒙古族古诗中最亮眼的主题。以《箴言》而言,它是蒙元以来与“大札萨”配合而进行报国奉公教化的道德诗训。《蒙古秘史》有一些记载,但大量内容却在十七世纪后的罗桑丹津的《黄金史》(即《罗·黄金史》)、《成吉思汗传》等书中较好地记录保存下来。据国际蒙古学界的几位学者将《罗·黄金史》与《蒙古秘史》加以详细对照研究后指出:《罗·黄金史》抄录了《蒙古秘史》的大部分内容,并有相当多的书写形式与《蒙古秘史》一致。有的片断资料往往把成吉思汗对将士及后继者所说的带有惩戒或规劝性的著名言论串在一起。这些资料可能是引述了我们尚不知晓的古代蒙文文献中钩稽出来的成吉思汗大札萨的条文。据此,《罗·黄金史》的作者充分运用未加利用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来重构这段历史,是许多学者多方考证得出来的结论。因此《罗·黄金史》是17、18世纪以来蒙古文诸史中记录箴言条目最早、最多而又比较准确的蒙文典籍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选择以何种文本确定条目时,就下决心只从《罗·黄金史》中筛选,如此一来,把比较复杂难办的事搞得十分简单,可以心无旁骛,朝着一个方向去挖掘筛选,因而条目很快拟定,进展可谓顺利。从效果看,条目内容虽分别从六七个方面集纳披露,但从整体内容看,无论是成吉思汗本人训谕,还是老臣对属下及后辈的种种教诲,其人物形象还是生动的、丰满的,其事件之来龙去脉是合理而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与《蒙古秘史》记载相比,二者颇为契合统一,无明显歧异,说明资料来源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的确有其真实性和科学之处,把它译成汉文,实为必要。上世纪关于《成吉思汗



箴言》的蒙文单行本,确有数本出版,但汉译文罕见,即使有汉译文,也是笼统地从一些资料中综合整理编译而成,出处都不明确,甚至在内容上与其他训谕诗互相混淆,把什么是《成吉思汗箴言》的明确界定搞得十分混乱。故本《箴言》译文首先确定蒙文本的范本,且每一条目的何节何页都清楚注明,以此有利于懂蒙文者的对照研读,可检验译文之正确与否。

为说明《箴言》和一般训谕诗的情况,在此将《智慧的钥匙》全诗译出纳入。《智慧的钥匙》(以下简称《钥匙》)与《箴言》从基本形式而言,两者都是进行训诫教诲的诗歌,即通称的“训谕诗”,因而都含有启人智慧、如何修身、待人接物的人生道理。二者如何区别呢?通俗地说,发言人的身分不同,内容自然各异。《箴言》是出自一个君主之口,谓之“金训”,必定较多地涉及安邦治国、制度、法令等国家的大事;《钥匙》是出自佚名作者,或贤士、或高僧,当然偏重于如何修身、行善、交友处事方面的劝告。从协调人际关系来说:前者是皇裔贵胄、官宦将士;后者是左右亲朋、平民百姓。由于身分对象不同,即使同性质的启人心智的格言口谚也各有特色,气质形态不同,因此两种训谕不难区分,关键是范本的选定。《钥匙》是十三世纪,即元代开始在民间流传的训谕诗,全诗后收入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荣编《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中,可称比较权威的本子,从以上两种本子仔细加以比较,《箴言》和《钥匙》的训谕条目内容特色泾渭分明,决无雷同混淆之嫌。《钥匙》问世以来,以其质朴率真、平易近人、说理生动深刻而启人智慧,增长知识,使蒙古人受益匪浅,数百年来一直得到蒙古人的爱戴,成为大漠南北广大蒙古青少年学子的启蒙读物和良师益友,这样一册在蒙古族知识分子中无人不晓的蒙文读物至今也不曾有过汉译文,实是令人遗憾。今大胆尝试,全译和盘托出,不知是否能传达出原蒙文作品之本意和精神实质,望在社会检验中作出判断吧。

箴言训谕诗是一种说理性诗歌,它是蒙元以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歌形式,是吸收民间诗歌的多种滋养创作而成,是作家文学而不属民间文学范畴。箴言训谕诗与二、三、四言较为普遍的蒙古民间诗歌不同,而是多以五、六、七言形式出现。为何有此区别?因为说理靠简短急促的诗文是无法将问题说清道明的,只有舒缓曼卷的多言诗才能胜任,解此难点。故凡说理诗作,都是词数比较多,诗行比较长的诗,这种风格的出现,可以说是蒙元时期带来的变化。因此,箴言训谕诗在蒙文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带关键性、具有转折作用的诗体。

叙事诗也是蒙元期间兴起的一种诗歌形式,它植根于民间诗歌沃壤,

依据成吉思汗的历史传说、逸事敷衍而成的一种诗韵故事，即叙事诗。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叶，是蒙古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一个风云激荡，拼搏进取、昂扬蹈厉、乐观豪放的英雄时代。在这一时代精神激励下的铁马金戈逐鹿中，最终呈现出华夏一统，南北一体、东西贯通、亚欧连结的全新局面。斯时，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法制都有崭新创造，并给世界以巨大影响。于是缔创这一奇迹的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族人民最杰出的领袖和祖先，其种种传说，便在民间广泛传播，最后载入史册，从叙事诗来说，其中有描写突发战例的（如《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有表现不惧权势的孤儿之智慧勇敢的（如《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卿》，亦称《孤儿传》）；在处理君臣及主人与乘骑关系的思想主旨中，则有国事为重、按礼法治国的呼唤；有和衷共济、和谐相携“中和”之道的张扬（如《箭筒士阿尔嘎聪的传说》、《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这些愿望的表达，正是当时社会现实急剧变化的反映。由于创作者对现实的关注，故能随时势之变化而观念更新，首先从题材上突破古典英雄史诗的套式，依据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撷取其中某一侧面深入开掘，揭示矛盾，多方面反映现实生活。故流传下来的叙事诗，多以篇幅短小，题材多样化，以细微显真谛，从不同方面揭示鲜明的主题为其显著特点。因此，往古史诗那种磅礴起落的铺陈笔法已经难以表现这样的内容，故叙事诗在形象塑造上一改古典英雄史诗大笔浓抹，尽情渲染的浪漫手法，而是在概括生活真实的基础上，严密组织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挑选典型的情节和细节来刻画人物的心灵和外貌，所以从蒙古族诗歌发展的风格变化来说，蒙元叙事诗是从古典英雄史诗的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变化的一次大飞跃。这种严格按事物本来面貌描写的传统，实是由《蒙古秘史》开启先河。罗桑丹津深受其影响，将《秘史》奉之为圭臬，沿着前人的足迹，悉心甄选考辨前人没有来得及利用的文史资料，搜集民间广泛流传的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逸事，把历史和现实的民间真情加以串通结合，使《罗·黄金史》独具风采，它既有历史上的认识价值，也有蒙古语言文学、民俗风情方面的史料价值。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传说，在十七世纪后的蒙文历史文献典籍中记载颇多，除《罗·黄金史》、《成吉思汗传》外，有的片断亦纳入《黄金史纲》、喀喇沁本《蒙古源流》、拉喜朋楚克的《水晶念珠》中，这些传说故事以散文故事和叙事诗歌两种形式记录入册。有的散文故事对成吉思汗加以神化，明显是因袭了民间传说故事的传统，而叙事诗中的成吉思汗形象，决无虚无缥缈、神怪空幻的色彩。叙事诗总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作真实的描绘。它在把



握历史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上,在创作实践上的严肃认真和精雕细刻上是历史传说故事难以企及的。据此,我们从反映蒙元时期的文史著作的成就来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写实、创新”是成功的关键和根本。这里所说的创新,固然有对成吉思汗形象评价之新,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情趣盎然的传说故事,寄寓着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和缜密思考、对朴素哲理认识的追求和企盼。叙事诗创作的这一思想成果,实际是蒙元以来开拓创新精神的进一步升华和发挥。古代叙事诗的蒙文原作除存于上述十七世纪后有关的蒙文历史文献典籍外,策·达木丁苏荣将以上原作及以后从民间搜集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纯韵文)全部辑入《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中,汉译文《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卿》、《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纯韵文)已收入《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本书将《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箭筒士阿尔嘎聪的传说》译就收入,那么,古代叙事诗的基本面貌便可通过这些汉译文作品得到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洪锦祝颂册》是布里亚特学者策·扎姆查拉诺于二十世纪初从鄂尔多斯搜集并带回俄国,藏于列宁格勒。“洪锦”是鄂尔多斯地区喜庆时吟诵祝词的艺人,这本洪锦吟诵的婚礼词(下简称《祝颂册》),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荣对其错别字进行勘对后,编入了《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的第一卷中。它开始并未引起注意,因为婚礼词之类的本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不少蒙文本问世,但汉译本极少。我在写文学史《婚礼祝词》一章时发现尽管蒙古族婚礼仪俗一套规矩起源很早,文献也有记载,但要找到反映古代婚姻仪礼的婚礼词却是难以寻觅,为此颇为烦恼,后来遍寻中发现策·达木丁苏荣有《祝颂册》是十四、十五世纪著作的说法,但他并未具体说明论证,是根据整体内容和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一般规律作出的判断。可是深入到具体内容,从一些祝词表现成吉思汗,忽必烈历史人物的内涵中分析,该祝词的最早版本只能是元末,不会更早,以后明、清时期逐步完善成熟。这就充分说明策·达木丁苏荣对《祝颂册》出现的时代的推断无误,足证其鉴赏古文献之深厚功力;其次,《祝颂册》对自然、社会人生缜密精湛的分析认识,以及婚姻仪礼套式之环环相扣,形式之完美,可看出这时期的蒙古人无论在文化知识还是思想认识水平上都大大不同于往昔。其辨析说理诗章,眼界更为开阔,对宇宙世界有了更深层的哲理思考,这正是受当时儒、释、道各学派学术之交流影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祝颂册》虽然来自民间,却带有浓厚的书卷气息,疑似有文化素养



较深的民间高手、或喇嘛高僧参与其间,甚至为之主笔。此次译成汉文公诸社会,可谓首次与读者见面。

谈起对近代文人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其由来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谈起,我来内蒙古的第二年,蒙文不懂,胡尔查先生提出与我合作翻译古拉兰萨的格律诗,他译初稿,我再按格律形式去整理。于是1962年《草原》第7、8期合刊上刊登了我们合作的21首汉译文诗歌,并附评介分析文章,这是首次将古拉兰萨汉译文诗歌公之于世。从此,激发我学习蒙文的兴趣,1963年进入了内蒙古大学陈乃雄先生蒙文初级训练班学习,一年的功夫,一册《蒙文入门》学完,有不少收获,建立了信心,从此我特别注意文人诗歌方面的翻译。1981年4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额尔敦陶克陶编著的《蒙古族近代著名文学家》一书,古、尹兄弟的诗歌基本出版完备,这就为研究他们的诗歌打下资料基础,平时也逐步琢磨译成汉文,长期坚持,颇有成效。由此开头,无论文学简史还是详史,近代文人诗歌一章便成了我的专门研究课题,因此,将这部分诗歌译成汉文就成了笔者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古、尹兄弟中,尹湛纳希小说的汉译工作,成绩斐然,但他们的诗歌翻译却无人问津,因此,他们四弟兄的汉译文诗歌集从未面世。其原因在于古、尹兄弟是学习汉族律诗、绝句形式创制的崭新蒙文格律诗,译时不仅要把握其诗歌原意,还须在字词数及平仄押韵上有个基本规范,因此要达到近体诗那样的译作,实非易事,故少有涉猎者。从实际情况说,像这样的翻译,要达到信、达、雅的统一,确实很难,对谁来说也不一定有把握。可考虑到许多译诗已作为引证资料进入文学史著,为何不再作一番努力,把它彻底完成公之于世,让读者去评说呢?所以古、尹兄弟的诗歌及鄂尔多斯两位诗人的诗歌就是这样硬着头皮完成的。

本册除收入近代文人的诗歌译作外,还选择收入了少量反映近代生活的祝赞词作品,何以如此?主要认为这些作品几乎近似对农业经济出现后蒙古农牧民生活变化之真实性记录;一些出自早期版本的精彩短篇祝赞作品,实际上已具有保存人文历史丰碑意义之价值和作用;还有多年遍寻不得,突然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蒙文刊物上的民间珍贵口述作品(如《东部区场院祭祀》、《库伦旗祭石碾仪式》)。这类作品对文学史的写作,与其说它是“锦上添花”,还不如比喻为“雪中送炭”更为恰切。这些令我感到亲切、富有纪念意义的作品,自不能弃,便选入集中。

“散论”是本书第二部分的论文集。这些文章基本围绕蒙古族文学、



民族学、民俗学及北方民族史方面的问题论述,由于每篇文章前有短文“说明”交待,故不予具体赘述。但需要交待的是:“散论”中的文章虽包括置辨评析、研究探新、学术交流、研究总结等等,这些文章虽然解决的问题和角度不一样,但研究探新还是散论集册的中心环节,其论述的大部分范围也还是“古诗译萃”中列入或提示过的诗歌资料。举例来说,关于古代叙事诗的话题是散论集册中探讨较多的论题,从叙事诗的版本、题材、体裁、艺术特点等等均有质疑探索的种种争辩,仅《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叙事诗的形象和主题思想方面的讨论文章,在八十年代还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潮的尾巴和阴影,而到九十年代则有了明显变化,它一扫往日影响,以全新的视点观照,即以人生启示的哲学理念来观察分析一切事物,从而面貌大为改观,问题迎刃而解,这一变化,就是通过文章的汇集对照才得以明白的。由于经过曲折的探索历程,对作品思想深度的领悟就更为深刻清晰了。还有《蒙古族婚礼祝词的艺术特征》一文的选入就有了对《洪锦祝颂册》的诠释解读的参考论证。古拉兰萨、尹湛纳希四兄弟的现存诗歌基本译就收入,而要了解蒙汉文化交流之历史渊源,古、尹兄弟受汉族古典文学影响之具体途径及其诗歌创作的特点,“散论”中的长文《论古拉兰萨诗歌及其诗派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就是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析论证的参考详文。所以“散论”和“古诗译萃”并不是各不相涉的两张皮,在某种角度上看,文论与译诗彼此依存、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我希望出现这样的效果,但结果如何?还得由读者诸公检验。

最后四篇关于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文章,除《编写〈蒙古族文学简史〉的体会和认识》一文在刊物上发表外,其他三篇从未公开发表。

本书的《国际通用书面语拉丁音标》的标注,藏传佛教专有术语的注释,得到了语言所包力高、文学所巴图二位先生的热心相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2006年11月15日完稿

目 录

前 言 / 1

赢 金 端 古诗译萃篇

成吉思汗箴言 / 3	085 成吉思汗箴言 / 3
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 / 29	000 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 / 29
箭筒士阿尔嘎聪的传说 / 38	085 箭筒士阿尔嘎聪的传说 / 38
智慧的钥匙 / 43	085 智慧的钥匙 / 43
洪锦祝颂册 / 62	085 洪锦祝颂册 / 62
古拉兰萨诗歌 / 96	085 古拉兰萨诗歌 / 96
贡纳楚克诗歌 / 127	085 贡纳楚克诗歌 / 127
嵩威丹忠诗歌 / 133	085 嵩威丹忠诗歌 / 133
尹湛纳希诗歌 / 141	085 尹湛纳希诗歌 / 141
伊希丹金旺吉拉训谕诗 / 160	085 伊希丹金旺吉拉训谕诗 / 160
贺希格巴图诗歌 / 178	085 贺希格巴图诗歌 / 178
上梁祝词 / 243	085 上梁祝词 / 243